

是未来世界的擎天柱，还是一个美丽的泡沫？

众说纷纭新经济

□雨 声

什么是新经济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新经济”这个词频频出现在报章之中。“新经济”似乎已经取代“知识经济”，成为国际上最热门、在国际研讨会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国内的媒体和市场分析人员，也在大量使用这个概念，并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和潮流。

“新经济”事实上被人们在不同的场合赋予着不同的涵义。最初，新经济是用来指美国经济在近几年所表现出的一种状态：在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基础上长期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这使传统意义上描述失业与通胀反向相关关系的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不再适用（因此是“新”经济），但是后来随着“网络股”的飙升，国内外的许多人在许多场合把以信息、网络业为代表的所谓“新科技产业”或“科技板块”称为“新经济”而把其他所谓的“传统产业”称为“旧经济”。

实质是信息化和全球化

尽管有关“新经济”的说法很多，但流行频率最高而又最具有新

时代气息的却是“网络”这个词。在反映“新经济”在经济全球化态势方面，网络经济的表述比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更贴切。网络经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全球化为外在形态，而信息化和全球化正是“新经济”的实质。

在过去的20年中，“新经济”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还魔术般地呼唤出各种目不暇接的信息产业，并使它们取代了汽车等作为发达国家工业象征的传统主导产业集群。如今在美国，信息产业已占到整个经济的1/4以上，而汽车工业仅占4%。

网上交易激增昭示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美国商业部的调查报告显示，1999年第四季度，美国网上购物总额达到53亿美元。按照商业部的统计，美国1999年10月到12月全国商业零售行业总交易额为8221亿美元，网上交易额占总数的0.6%。

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进行网上交易的调查统计。美国商业部长威廉·德雷宣布，从今以后，各商业机构需要报告零售额中有多少来自网络，以便政府及时了解网上交易的

发展情况，分析互联网对商业零售业会产生哪些影响。威廉·德雷认为这一报告预示了美国新经济时代的到来。

美国人重视新经济

4月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新经济会议”开幕式上说，世界正处于由计算机和互联网相连接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经济转换中，而由此产生的难以置信的众多商业机会，将会“同贫困宣战并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梦想”。

克林顿表示，我们正处在有史以来最持续的经济扩张的中期，而经济转型正如同引导我们进入工业革命那样具有相同的意义。他说，“我相信，计算机和互联网将带给我们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快捷的摆脱贫困的机遇。”克林顿召集了从格林斯潘到比尔·盖茨等各界精英齐聚一堂讨论所谓的“新经济”，思考目前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经济繁荣。

经济会议主席、同时也是克林顿1992年入主白宫以来的重要助手斯柏林说，尽管近段时间股市多变，市场起伏不定，但白宫相信支撑美国经济的基础——繁荣的高科技业与传统产业——仍都相当健全。斯柏林告诉记者说：“我们相信，经济的根基仍然非常非常强劲稳固。”他接着说：“我认为，新经济表现得相当好，我不认为应该根据仅仅一天、甚或一个月的市场走势，

来判断我国经济基础的实力。”

新经济要革传统理论的命

格林斯潘一直认为，“华尔街股市连连大涨的‘财富效应’，会加速美国通货膨胀失衡的风险”。美国“新经济”学派对他的观点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有人甚至要求他回到大学课堂去重温关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批评者指出，格林斯潘所依据的“经典经济理论”已越来越不得人心。他们指责从去年6月以来美联储在格林斯潘的推动下实施的5次所谓“先发制人”的利率调整政策，犹如一团乌云悬浮在美国经济和股市上空。在他们看来，格林斯潘仍以“旧经济”的法则解释在技术驱动下迅猛发展的“新经济”，开出一付调高利率的传统“药方”。近25年来，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失业率一旦降至6%或更低，就会引发通货膨胀。然而美国目前的失业率已降到近30年来的最低点4.1%，却连通货膨胀的影子都没看到。

格林斯潘还警告美国经济以目前的高速度增长，势必会出现商品短缺现象。这更是引得批评者大加嘲讽，他们指出，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已连续保持109个月的增长，去年第四季度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达到了6.4%，劳工成本一直保持在有限的水平之内，却根本看不到任何商品短缺的迹象。

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市场预

测公司首席顾问里查德·萨尔斯曼说：“如果格林斯潘认识到去年的生产率比实际公布的数字还要高 3 倍，他非要晕倒不可。”根据萨尔斯曼的算法，1988 年至 1998 年间，美国生产率年增长水平一直处在 6.2% 的水平，而不是美国劳动统计局公布的 1.7%。格林斯潘说，剩余劳动力的紧缺势必有一天会迫使雇主以提高工资的方式，来向紧俏的市场争取员工。而持反对观点的人士则指出，员工工资的走势与消费价格指数是相符合的，只要消费价格指数没有呈现出通货膨胀的迹象，员工自然不会提出超出生产率增长水平的工资要求。从美国当前的社会现状看，员工队伍也确实没有提出要求增加工资的强烈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持续提高所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消费者能够长期享受低廉的物价水平。

新经济将使世界发生巨变

芬兰图尔库高等商业学院未来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尔库·维莱纽斯最近发表谈话认为，在今后一二十年，新经济将以锐不可当的势头蓬勃发展，世界将因此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维莱纽斯认为，工业化时代正在步入最后的发展历程，网络社会已经显现雏形。他说：“我们现在处在两个时代的过渡期。再过 20 年的时间，我们将生活在另一种社会。新经济不是稍纵即逝的时髦，而是

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

这位专家进一步说，新经济与信息技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高科技企业股票的飙升紧密交织在一起，现在发生的一切仅仅是一个前奏和更为广泛的变革的一部分。

第三只看新经济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的退潮，使人们能够以更清醒的目光看待新经济。不少经济学家认为，高科技公司在整个经济所占比重已大大增加，但其实非然，他们所用的经济指标有夸大新经济规模之嫌。

美国商务部在去年 6 月份公布的一份调查中预测，数字经济（计算机硬件、软件及通信产品）占今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 8%。自 1994 年以来，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5%。

但已有不少专家对于上述数字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以不变美元和现价美元价格来衡量信息产业的规模存有相当大的误差。如以不变美元价格来估算，1980 年企业在信息产业领域的支出占公司总资产投资的 10% 目前已至 60% 但以现价美元价格来测算，企业用于购买计算机的投资占资本总支出不过为 35%。

高盛公司新近完成的一份报告也认为，所谓新经济的内涵太过丰富，类似基本电信服务、广播、电视及家用电子等产业早已存在多年，根本不应纳入新经济范畴。如将上

述产业剔除后，他们测算电脑及通信技术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 5%。新技术产业的规模较汽车产业略大，但低于医药及金融产业规模。就世界而言，技术部门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更低，在 3%到 4%之间。

那么作为电子商务主体的互联网是否将如预期地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出惊人贡献呢？虽然目前电子商务份额较小，但一些互联网顾问机构预测 2003 年美国电子商务总额将增至 1.5 万亿美元，占 GDP 的比例高达 13%左右。

高盛公司认为，将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进行的商品及服务贸易额全部归于互联网同样有误导之嫌，实际上，精确统计指标应该是互联网销售所带来的附加值，高盛就将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如 Amazon.com）及其他网络零售商使用的技术和软件作为统计指标 以此衡量网络占 GDP 的比例不到 1%。

经济学家还发现，由于信息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价格较其它领域下跌速度快，因此很难精确计算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比如官方数字显示自 1992 年以来，美国企业在信息产业的投资支出在名义条件下以每年 12%的速度递增，但在实物条件下却高达 40%。比例如此之高，主要原因在于它对利率的调整过于敏感，信息产业的产品价格和质量易受利率调整的影响。

（摘自《环球时报》）

□李 颖

西	部	开	发
的			
五	个	问	题

西进序曲

春节之后 照例又是“民工潮”，但是有点怪，往年是一窝蜂地拥向东部沿海城市，今年连西安、重庆这样的西部大都市也明显遇到了客流的高峰。显然，很少读书看报的“民工”比城里人对于国家政策导向有着更为本能的敏感。

整个 3 月，西部开发的话题都热得烫嘴。中央成立了开发办，总理亲自挂帅，17 位部长全部列阵，各部委有钱的出钱，有政策的出政策，专家学者纷纷出来“仙人指路”，报纸电视更是连篇累牍地摇旗呐喊；一些地方政府驻京办的人员大为扩充 自然是为了“跑部钱进”留在家里的官员则为了招商引资，忙着抛出各式各样的“政策红绣球”。

3 月 26 日“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启动，这项工程将铺设起于新疆塔里木盆地 终于上海 跨越 9 个省

市 全长 4200 公里的天然气管道，总投资预计将达到 1200 亿元 是仅次于三峡工程的第二大跨世纪工程。它的启动，标志着中国的西进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4月4日，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安隆重开幕，同时还举办了“东西部旅游博览会”和“西部大开发研讨会”。

一棵树上结出两种果子

中国西部地区拥有超过全国一半的土地面积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改革开放20年，东部的兴起和西部的衰败，就像一棵树上结的两种果子。即使在西部，发展也是分化的，像西安、成都、重庆这样的城市，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但西部也有全国一半以上的重点扶贫县。中国 4200 万贫困人口中，大多数都分布在西部。

为什么在一棵树上会结出两种果子？有人说是因为东部占了便宜，先享用了改革开放的大餐，西部吃了亏。不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西部传统的资源消耗性企业的原材料，绝大多数被国家以低价调拨的方式支援了东部；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享受的一些优惠政策西部也没有捞着；国家投资上也明显偏向东部。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在 1992 年邓公南巡之后，国家已经大大放松了地方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可是 1998 年为止，西部吸引外资仍

然仅占全国的 4%，而东部地区近 90%。西欧某国有 1200 家企业在中国投资，而投资到西部的不超过 20 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家的政策和投资也更多地向中西部倾斜，在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逐年上升。但是，东部经济的复苏速度仍然大大快于西部。

西部自身的问题也许更值得西部人去检讨。

西部的“虫子”在哪里？

早在去年上海财富论坛上，陕西省省长安东就向跨国公司的巨头们下了请柬。3月，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的外商招手：可以投资、控股，也可以参与管理。中国将实行与东部地区相似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但是外商好像并不着急。中国德国商会会长鲁道夫对甘肃省委书记孙英讲了一个鸟和虫子的故事，颇耐人寻味。他说：我们并不是看不到这个市场。上个星期二，我们和在北京的国外商会，一起参加了贸促会组织的一个西部开发的邀请会，会后有一个日本人是这样说的，就是早来的鸟可以吃虫子。他说我们公司已经来了好几年，在西部有不同的投资，但是应该说我们来得太早，天还黑，看不见虫子。

鲁道夫的谨慎代表了许多国内外投资者对西部投资环境的忧虑。这个环境，既包括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

在西部某地，上一个项目手续

繁琐，最多时从申报到批准竟要盖上 200 多个公章。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贵州省的两会代表刘锡良教授的亲眼所见。

东部企业西进的先锋——康佳的总裁陈伟荣对此也是深有同感：“我在深圳很多年都不用登政府的门，可是在西部要经常亲自找政府领导批条子。”

但是比起另一位广东客商陈先生来，陈总还算是幸运的。陈先生一行在川东北某县考察时，得到一份县政府的地方产品促销工作会议纪要。“纪要”称：保护本地产品是“工业兴县”“商贸活县”的重要手段。“纪要”规定：县内各宾馆、酒店等除世界名酒、中国名酒外，一律不得销售外地酒类产品，只许销售本地产品；凡本地有的外地同类产品进入本县须先经税务、工商部门收缴足额税费后才能上柜；交通、交警部门要从交通规则、装载标准、车辆性能、证照方面对运载外地产品进入本县的车辆进行制裁；技术监督部门对外地产品要严格检查，重处重罚，绝不手软。同时还强调各执法部门要站在发展地方经济的高度保驾护航，县里实行严格的奖罚考核，并每月组织一次检查。

类似的经历，陈先生在川渝好几个地方都有遭遇，这样的投资环境，自然让他望而却步。西部的问题，不是可以通过造势和简单的几条优惠政策就可以解决的。西部，要跑步，更需要苦练功夫。市场观

念，法制观念，地方政策的透明度，办事效率，生产要素市场，经营管理人才……这些都是西部需要花大力气去改善的。

西部大开发关系到中国的“第二个大局”，邓小平的这句话意义深远。但是改革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面对历史和教训，我们要先问 5 个问题：

大开发如何防止大腐败？

去年重庆惩办了贪污挪用三峡移民款的王素梅、黄发祥，今年两会期间，江西枪毙了胡长清，但是“王八蛋工程”“豆腐渣工程”看样子还是不能绝迹。

有人说：监管不严，工程往往意味着腐败，大工程意味大腐败。国家重大项目稽查处日前通报，项目建设中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稽查工作中不少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较为混乱，其中有 35 个项目挪用、挤占建设资金；相当一部分项目概算控制不严，近 30 个项目严重超概算；许多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执行不力；“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屡禁不止，施工队伍良莠不齐，“一级队伍投标，二级队伍进场，民工队施工”的现象较普遍，监理队伍“外聘人员多，离退休人员多，无证人员多，现场服务人员少”部分工程质量较差，有 28 个项目存在质量隐患，其中有 9 个项目发生质量事故，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越穷困的地方，腐败的机会成本越小，腐败的动机越大。云南昆禄公路事件，三峡移民款案件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审计局及时发现，数以亿计的三峡移民款，近 8% 将不翼而飞。是不是国家的每一笔投资都要另列 8% 作为项目的“腐败折扣”呢？黄发祥一个小小的科长，就敢伸手拿 1000 多万的移民款，国家要投 8000 个亿为西部打基础，不能不防这些黑手再伸进来。

大开发如何防止大破坏？

朱总理说西部大开发要防止一哄而起，这是经验之谈。80 年代的西部开发热没有能够把西部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反而挖得西部千疮百孔，小煤窑，小钻井，小金矿……浪费资源不说，把环境全给糟蹋了。现在西北 5 省水资源总量只占全国的 8%，加之气候特征和地形特征的影响，分布十分不均匀。西部要开发，人口要增长，必然会增加水资源供需的紧张关系，而水资源是有限的，一些地区开发利用的程度已经达到 100%，到了增长的极限。而在西南的贵州等地，虽不缺水，但因是喀斯特地形而缺土，由于在坡地上砍林开荒，导致水土流失后岩石大面积裸露。

据梁从诫教授的估算，西部现在每年沙化土地仍在 370 万亩左右。目前中国每年荒漠化的总净扩增面积已经超过 1000 万亩。朱总

理提出的“退耕还林 封山绿化 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确是个好主意，但不知道地方政府能贯彻多深？坚持多久？也许开发不如转移，把生态危机区的人口迁出来，让大自然休养生息更为可取。

大开发如何防止大浪费？

西部以前的“三线”建设开发区热，80 年代在资源导向型战略下粗放经营造成的巨大浪费，到现在已经无法统计了。昨天仍然历历在目，今天又要快马加鞭，大开发怎样防止大浪费，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其实，中央对西部的投资并不少。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沿海省份往往被看成是“前线”而使得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十分谨慎。“一五”期间国家安排了 156 个大型骨干项目，其中仅陕西、甘肃就占 40 个。从 1964 年起连续 3 个五年计划，有几年曾经把一半的钱花在西部的“三线建设”上，累计投资 2050 亿元人民币，后来调整时又花了 700 亿元；70 年代，国家引进 47 套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大型钢铁、石化设备 23 个放在了西部。但是这些投资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深深烙印，嵌在广袤的西部上的一些工业区也随着历史的变迁而逐渐暗淡。

长期以来，一提搞开发，许多官员想的就是有多少钱，但是怎么把钱花好，用好，则思之甚少。重复建设，盲目引进，大权独揽，一意孤行，

最后连国家投资都当了“冤大头”。现在的“三拍”项目并不少见，先拍脑袋决策，再拍胸脯保证，后拍屁股走人的依然大有人在，所以防止大浪费，首先要防止的就是决策性浪费。

环顾世界，政府主导投资的低效率和高成本带有某种普遍性。当年巴西为了开发落后的亚马逊地区，耗费巨额资金修建横穿巴西东西的长达 5000 公里的公路。受宏伟目标的驱动和在缺乏充分科学根据和可行性报告的情况下，修路大军匆忙上阵，结果该公路建成后由于热带雨林气候的影响，雨季时间太长，公路的使用率仅为 50%。同时实施的移民计划也因公路无法正常使用和缺乏医院、学校、商店等相应的配套设施而告吹，浪费了大量资金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殷鉴未远，可不慎乎？

政府：四两怎样拨千斤？

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投资效率值得怀疑，就中国来说，政府的财力也不可能独木擎天。

虽然国家年财政收入已经过万亿，但是占 GDP 的比重也只有八分之一。西部许多地方政府早已是“吃饭财政”，更是有心无力。同时，老百姓手里的 6 亿万存款仍然躺在银行睡大觉。从去年以来，启动民间资本“四两拨千斤”已经成为上下的共识。

但是千呼万唤，民间资本就是

启而不动。现在赶上西部开发，政府又面临一项挑战：怎样让民间资本更多地流向西部？

其实，民间资本动不动就流向哪里，本来应该市场说了算。美国开发西部，从开荒潮、淘金潮、石油潮、到克林顿的“新市场倡议”，政府从来只搭台不唱戏，尽可能让投资者唱主角。美国政府所做的，无非就是颁布一些更利于西部开发的法律法规，比如著名的《宅地法》以及减税等等，核心就是权力不介入市场，藏富于民。

现在西部多数省份的国有企业比重高达 70% 以上，多集中在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传统工业上，而且分布也不均衡，中小企业居多，兼并重组的进展缓慢；而东部正好相反，通过这些年大胆的摸索和实践，广东、福建、浙江的非国有经济比重已经在 70% 以上，沿海其他省市也在 50% 以上，并且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工业结构，电子、互联网等新的经济增长点方兴未艾，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已开始扬帆出海，跨国远征。

事实上，在经济较发达的省份，部分“开禁”的产业已由国家企业控制，产业进入门槛高，在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在这些产业的垄断优势并不明显，民间资本的进入空间还是很大的。如果地方政府也能够善用政策，尊重市场，那么，民间资本积极投向西部是可期的。

谁能让孔雀西飞？

“人才如果继续流失，西部开发就是扯淡！”陕西政协委员刘锦才这句话最近常常被人提起。号称“人才大省”的陕西，90年代前5年，全省平均每年流出人才4895人，1996年以后有所减缓，但每年仍有2400多人。

据青海省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的统计：截至目前，青海省有初级职称和没有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11万人，中级职称2万人，拥有副高级和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仅有1800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400人，博士七八位。这一数字和全省500多万人口相比，实在是太少了，而人才流失现象却难以控制。

贵州省目前有专业人员48万，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1.3万人，每万人中间仅有3.8人，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在这1.3万人中间，35岁以下的仅占2.5%。这些高级人才70%呆在文教、卫生和科研部门，直接从事开发生产和管理的人为数不多。35岁以下的人才去了哪里？孔雀东南飞了。1995年以来，全省调离的专业人员有3412人，其中70%以上是获得高中级职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技术总是跟着人才跑，人才总是跟着资本跑，资本总是跟着利润和机会跑。企业缺乏活力，地区经济缺乏吸引力，人才流失，自然而然。有人说何止孔雀东南飞，

连麻雀也东南飞了。仅四川在沿海的打工仔就有近千万，每年寄回家乡的钱不下百亿元。

美国硅谷的崛起是值得西部人深思的。20年前它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峡谷地带，靠不断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家和人才，成为今日财富的象征和富翁的摇篮，人们就像当年拥入旧金山一样，拥入硅谷去淘金。但是硅谷并没有硅，硅谷只有像英特尔、苹果这些充满活力的企业，它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全世界的梦想家。

（摘自《南风窗》）

名医的幽默

法国内科医生阿尔曼·特鲁索曾治好了一个女性瘰病患者。女患者硬说自己吞下了一只蛤蟆。医生在一次例行出诊时捉了一只蛤蟆随身带着。他让女患者喝下催吐剂，当女患者呕吐时，他悄悄地把蛤蟆放在盆里。

——夫人，您的病因就在这里！现在您将完全康复！

——要是蛤蟆在我肚里下仔怎么办？

——这不可能，夫人，这只蛤蟆是公的。

（摘自《生活与健康》）

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

□吴敬琏

资源配置方式未根本改变

中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就的基本标志是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显现出来了。在过去的 20 年里，原来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已有了初步的改变。拿工业来说，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 1978 年开始改革时的 78%，下降到去年的 33%，非国有经济的份额从 22.2% 提高到 67%。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 20 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的公认。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看，改革的大关并没有过。

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经济转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现在，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高，大致上只占 1/3，但是从经济资源的占有来看，国有经济还是占了主要的地位。而国有经济的改革又很不令人满意，还远不能说市场已经在这部分资源的配置中起了基础性的作用。这样一来，就使得耗用了 2/3 最为

稀缺的资本资源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 1/3。

这是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

例如我们议论得很多的，政府很关心的所谓“重复建设”问题，它的根源就在于国有经济没有经过根本的改革和改组，却在资源的支配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类似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例如，国有经济效率低下导致金融体系脆弱等等。这里只讲一点：农村问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能得到提高，目前已经成为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农民没有钱？怎样才能使他们富起来？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关键的一条是把多达 1.5 亿人到 2 亿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去。为什么改革的后 10 年这种转移出现了停顿，甚至有反转移的情况？是因为我们的工商业没有创业的活力，或者活力没有得到发挥。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经济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另一方面是非国有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既得利益者 成深化改革阻力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

想重要原因在于一部分人在旧有的国有经济里面有错综复杂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特别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在旧有的国有经济体制里面有重大的利益。于是，要改革和改组国有经济和发展非国有经济，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我最近在匈牙利呆了一段时间。匈牙利同行们，包括 80 年代我们很熟悉的社会主义改革家们，很沉痛地对我说到他们的教训，为什么他们的改革到了 80 年代进行不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处于重要地位的人在旧体制的国有经济中有重大的利益，所以就采取一切手段阻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同时用给优惠政策、发补贴、放贷款等多种方法支持、扶植国有企业再生产党政企不分的旧体制。

在中国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呢？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共中央就试图要对国有经济发动邓小平所说的“摸老虎屁股”的攻坚战而且 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还就此作出了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这方面的改革进行得很不顺利，从这里看，国有经济改革的困难在中国也是存在的。

中央方针政策贯彻不力

中共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重大的突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十五大决定了要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调整和

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建立今后长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调整具体地说有三项内容：一是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资本要从一些部门退出；二是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三是促使私有经济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把十五大的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了。第一，把国家还要控制的领域约束在公益性的、关系国家安全的四个行业；第二，除了极少国家必须垄断经营的企业外，所有的公司都要实现股权多元化；第三，把放开搞活的范围从国有小企业扩大到中等企业；第四，要求在一切大型企业中确立能够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法人治理结构。

应该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是明确的，现在的问题是贯彻落实。这两年来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就是国有部门有一种忽视改革和改组，热衷于“跑步钱进”的潮流。为了克服当前需求不足的情况，财政系统用发债、增税等方法动员资源，用于增加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财政投资作为启动经济的一种手段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将它变成一种动员民间资源，救助国有企业的长期政策，就会引起微观上和宏观上的一系列消极后果。首先是强化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不可能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

而且长期使用这样的办法，会过分加重财政的负担，威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如果国有企业热衷于取得国家注入的资源而忽视自身改组和改革，其结果就会是复制旧体制，加强旧体制。

企业制度上须下大功夫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我认为：

出路之一，是按照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在国有资本退出一些部门或者不同程度地减持的条件下，把一切大中型企业改造成为符合《公司法》和国际惯例的现代公司。这就是说 第一 确立现代公司的多元所有制产权基础；第二，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第三 建立非执行董事 包括一部分独立董事 占优势地位的董事会，董事会要承担诚信义务（或称做受托责任） 第四 董事会要通过自己的经理人员任命委员会 报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对经理人员进行监督和激励 第五 要确保高级经理人员对日常经营事务的决策权不受干预，同时建立以绩效为基准的经理人员报酬制度 最后 要以保护全体股东利益为宗旨，对上市公司进行严格的监管。

这些工作都是很艰巨的。从现在正在进行的几个大的部门如石化、电信、电力、冶金等的改组过程看，在这里面碰到了许多很深刻的问题。譬如拿企业制度来说，不但

要解决在计划经济中形成的一些制度问题 还要解决在过去 20 年放权让利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制度问题。这些问题牵涉到社会上各种人的既得利益，要解决这些问题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说都非常艰巨，但是如果继续回避这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只会越拖越被动。我们只能横下一条心，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改组。

什么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针呢？我看还是要坚决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的决定，特别是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方针。这就是，第一，坚决执行有进有退的方针；第二，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制度问题；第三，要用一个新的、适合市场经济的监管体系取代政府部门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多方面干预的监管办法。

不从企业制度的根本上下功夫 而是用老办法“给政策”、“输血”等等来求得国有企业的短期维护，如此等等，这些误区如果不被打破，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就很难贯彻。

出路之二，在于大力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根据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有两件事情是必须做的：第一，在国有中小企业没有完全放开的地方，彻底地把它们放开。第二是各级政府必须对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企业，也包括民间自己创建的企业一视同仁地为他们扫清发展的障

碍，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再也不能延误时机了

与国有企业相关的种种问题已经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迟滞而拖得太久，不作出根本解决是不行的。特别是由于我国有望于近期加入WTO，留给我国进行认真的改革使自己能够在未来激烈竞争中自立于强手之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按照党中央已经确定的方针进行改革，避免由于延误时机而犯历史性错误。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已经涌现出一批较好地贯彻了中央的方针政策的地区，因而经济繁荣、就业充分、社会稳定的成片的地区，例如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这样的新气象。如果我们到这些地区去考察一

下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资源条件特别好，也不是因为国家给他们的政策特别优惠，国家给他们的投资特别多，国家银行给他们的贷款特别多，而是因为他们努力贯彻了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方针。一方面国有经济改革改组的力度比较大，另一方面，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得比较快。既然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见得好的地方能够做到，别的条件更好的地区当然更可以做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很乐观的。

（本文是吴敬琏教授在《中国改革回顾与展望——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摘自《南风窗》）

部长意见

干事将作家新写的小说送给宣传部长。

干事：“您让我看的小说我已经看过了，我认为还是不错的。”

部长摇了摇头。

干事：“我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错的。”

部长摇头。

“我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针对那些业余沙龙里的庸俗的知识分子。”

部长摇头。

“确切一点讲就是针对那些没有鉴赏力的人。刚才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

部长还是摇头。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很不怎么样的小说。”

部长又摇了摇头。

干事：“当然，也不能全盘否定。”

部长又摇了摇头说：“我这衣领真叫别扭。”

（摘自《大人笑话》）

仅有凯恩斯是不够的

□杨继绳

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

1929年 - 1933年 美国经济出现了大危机。那时多数经济学家迷信市场经济有自我调节的功能，“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地把经济从低谷中拉起来。而现实并非如此，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市场需求不足，政府必须想办法提高居民购买力 刺激消费 企业界没有办法扩大投资，政府必须担当起投资的责任。政府从哪里弄钱来投资呢？实行赤字财政。

罗斯福新政采纳凯恩斯的建议 运用财政、信贷两个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医治市场经济自发机制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供过于求的痼疾。政策重点是用需求带动生产。办法之一是实行赤字财政和发行债券，调动闲置资本用于生产和消费。办法之二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

美国经济在二战以后进入黄金时代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凯恩斯学说的功劳，但凯恩斯学说的影响是深远的。

凯恩斯在中国的遭遇

1997年夏天，中国市场疲软，连续几次降息对刺激消费毫无成效。中国经济学家表示：在目前情

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只能靠财政政策”。他们拿来了凯恩斯的办法：“运用财政或‘准财政’手段加大政府对公共基础建设设施的投资”，公共性投资主要靠政府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这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春天，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张被政府采纳。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扩张性财政政策付诸实施，当年国家财政直接投资1000亿元。1999年进一步扩大了财政直接投资。政府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努力提高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1999年国家财政为增加居民收入共支出540亿元，使全国8400万人受益。

应当说，凯恩斯理论对治理中国的通货紧缩起了一定作用，它阻止了经济继续下滑。但是，国民经济还没有走出不景气的阴影。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连续26个月负增长，企业经营困难。

凯恩斯的根本目标是扩大投资，刺激消费。恰恰这两点在中国产生的效果不佳。

政府投资没有带动民间投资，投资还很不景气。投资是拉动需求最重要的力量，它的不景气说明经济还没有启动起来。

为什么民间投资没有带动起

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投资者无钱可赚。所能看到的商品都过剩，往哪里投资？需求不足抑制了投资。这就进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逻辑怪圈：投资不景气—需求不足。二者互为因果。

凯恩斯认为，提高居民收入可以扩大消费需求。中国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提高居民收入，消费需求还是扩大不多。其中也有中国的具体情况，收入差别太大，少数高收入的人该买的都买了，没有什么需求；多数低收入的人有需求但没有支付能力。这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看，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相比，其差额由 1978 年的 209.8 元扩大到 1997 年的 3070.2 元。占全国总人口 70.9% 的农村消费者的实际消费只有全国居民消费额的 1/3 强。在城市居民中，占人口 20% 的低收入层和占人口 20% 的高收入层差别是很大的，就家庭年收入而言，后者相当于前者的 4 倍。

不服水土

凯恩斯在中国遭遇不佳，是因为他在中国“水土不服”。

美国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市场制度发达而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设之中，无法和美国相比。同样的政策思想在不同的制度基础上当然会有不同的结

果。例如，美国企业对利率非常敏感，一次调整 0.25% 就收效明显，中国利率调整几个百分点也看不出明显的效果。

美国以私有经济为基础，民间有大量的资金。中国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民间资金没有美国那么多，而且大多存在国家银行中，已为政府所用。这是政府投资没有带动中国民间投资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政府不同于罗斯福的政府。在美国，政企不分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扩张冲动也是没有的。在中国，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政企不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官员们还以追求政绩为目标，官员和企业对投资的效果不负责任的问题还没有根除。

在中国这方“水土”上凯恩斯的扩张政策效果不显著还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把扩大内需搞成简单的总量扩张，不加控制地实行货币和财政双扩张的政策，通过大量投入来求得 GDP 的增长。这可能会出现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地方政府逼迫银行贷款，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最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可能会重复前些年的“紧缩—通胀—紧缩—通胀”的循环。

好在政府比较清醒。中央曾经一再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期实行。

（摘自《半月谈》）

中国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

□ 阎学通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获得了一个“四化”建设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和平环境。在走入新世纪之际，中国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战略安全环境是国人所关心的。我们虽不可能先知先觉历史的具体进程，但是可以预测我国战略安全环境的基本走向。

卷入战争的危险将上升

90年代初，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治孤立和军事制裁的政策，但我国并没有卷入战争或有军事入侵之虞。随着台湾岛内分离主义势力的不断发展，1996年我与美国因台湾问题在台湾海峡形成了军事对峙。1999年李登辉改变台湾当局变相独立的政策，发表“两国论”实行了公开独立的政策。这使得两岸因台湾独立在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加大。

今后十年，台独势力将有进一步发展之势，因此我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也有进一步增长的可能。由于美国与台湾的大选在同一年，这种时间巧合使得美大选前的政治气候很容易朝支持台独的方向倾斜，因此2004年和2008年将是台独分子在台海地区引发军事冲突的危险时间。

今后十年我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虽然要大于90年代，但这种局部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或引发对我国的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很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发生过多起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虽然都使核大国卷入其中，但战争还是控制在局部战争水平上，而且大国之间也未实行相互大规模军事入侵的战略。其原因可能是多重的，但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只要新军事技术的发明在今后十年还不能防止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台海军事冲突还不致引发世界战争或陷我于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之中。

面临的战略压力将加大

苏联解体后，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由合作为主转向对立为主。由于美国是冷战后的惟一超级大国，也是最有实力对我施加战略压力的国家，因此双边战略关系的性质转变使我面临着美国巨大的战略压力。但90年代初期，国际格局正处于过渡时期，大国间的战略关系并不明朗。美国同时担心拥有巨大核武库的俄罗斯东山再起，担心日本与它争夺世界霸权，担心欧洲一体

化后与美国抗衡，因此美国并未以中国为主要潜在竞争对手。90年代中期，大国战略关系的模糊性消失，中俄、美日、美欧三大战略关系基本明确，于是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主要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1997年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担心。

今后十年，中美结构性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将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最主要的战略矛盾。美国称霸世界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与世界各主要力量之间产生战略矛盾，但与中国的矛盾最为突出。美国要在21世纪称霸世界，而中国“四化”建设的目标是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两个战略目标形成了一对结构性的矛盾。如果中国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中国六倍于美的入口将使中国的GDP远远大于美国。当中国GDP等于或大于美国时，美国就无法在世界上称霸。而且，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可能快于日本、欧洲和俄罗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美国就越担心。中美的地理位置以及中国十年内仍将是地区强国这两个因素将决定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对该地区多数国家产生重要影响。

中美战略矛盾的深化有可能促使美国增加对我军事压力。90年代美国对我施加的战略压力主要是政治压力，而今后十年则可能更多的是军事压力。近年来，国际军控

舞台的中心已逐渐从欧洲移向亚太地区。美国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计划，针对中国的色彩越来越浓，中美在国际军控领域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克林顿在1999年的国情咨文中已提出，美将在其后的六年里增加1100亿美元的军费，这将使美国年国防开支超过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总和。美国超军事实力的进一步提高，将促使美国倾向于在亚太地区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维护其战略利益。而且美国会更多地从军事上支持台湾提高军备水平，从政治上支持台湾“扩大国际空间”的政策，这些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国防现代化的压力。特别是，如果美国按计划于2007年部署TMD并将台湾纳入这一体系，我面临的战略压力将变得异常严重。

美国对我施加军事压力虽可能增加，但中美之间仍有战略安全合作的空间。今后十年，出现一个威胁中美安全的共同战略威胁的可能性较小，但防止中美之间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则是双方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为了防止台湾问题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中美双方将有发展安全合作的需求。至于双边安全合作能否有效地防止战争则取决于双方对危险根源的共识程度。

非传统安全问题将突出

在90年代初，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走私、贩毒、非法枪支